
一份来自加害者的证言

——中文版《东史郎日记》评介

孙宅巍

今年3月,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授权,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37万字的《东史郎日记》(以下简称《日记》)。

东史郎是一名觉悟了的原日本士兵。他于1937年8月应召被编入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任上等兵,旋至中国,曾参加华北、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地的战役、战斗,1939年9月因病回国;1944年3月,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1945年8月,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1946年1月被遣返回日本。他有记日记的习惯,经常利用战斗的间隙或战场休整期,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思记录下来。1940年至1941年间,东史郎在日本对第一次出征期间的日记进行了整理。1987年7月,他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日本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公布了自己的战时日记,其中包括记录当年南京大屠杀情景的材料。同年12月,他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节选后,交青木书店公开出版。该书出版后,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无理攻击,东史郎本人也因此被告到法院,并在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的两次审理中,均被判处败诉。

《日记》由南京大学日语专业教师负责翻译,东史郎特地撰写了4000字的序言。该书以大32开印制,编排醒目,装帧精良。全

书按日记原有形式,共分5卷:第1卷自1937年8月26日在家乡接到征召令起,中经参加华北作战,至11月13日乘船离开大连港;第2卷自1937年11月15日乘船驶入扬子江,中经参加攻击并驻防南京,至1938年1月28日登陆大连;第3卷自1938年1月31日从大连出发,中经参加华北作战,至4月21日驻防彰德;第4卷自1938年4月21日从彰德出发,参加徐州会战和陇海线战斗,至8月7日乘车离开开封;第5卷自1938年8月8日列车从归德出发,中经警备安徽蚌埠、合肥一带,至九十月间止。5卷日记,时间跨度为14个月,其中包括攻击南京及南京大屠杀期间。正文后并附录东史郎从军档案,自1933年1月31日入步兵第二十联队服现役,至1946年1月10日由上海返回佐世保港后遣散。

刚刚出版的《日记》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性:

一是资料的真实性。

《日记》所记资料,均为东史郎本人所见、所闻、所为之事实。它们记录于1937—1938年战场战斗的间隙,整理于1940—1941年,而出版却是在46年之后的1987年。仅从这串时间表上即可看出,东史郎所记日记,完全是在习惯与兴趣的驱使下,对军队生活的真实记录,并无出版和宣传的目的与动机。正如东史郎在全部日记之首所述:“我要在这里记下战场上的真实。只有通过记述真实,才能真正明白战场上的将士们的思想和行动。既然要记录真实,那么就要记录战场上的美与丑。”(《日记》第3页,以下所注页码均为《日记》)

引起世界轰动的“东史郎诉讼案”,源于《日记》中关于西本残害一名中国人的记述。在其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西本(即桥本光治)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前,将一个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燃烧,最后系上手榴弹,投入池塘将其炸死的暴行。西本否认暴行,引发了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围绕水塘是否存在、邮

袋能否装下一个人,以及手榴弹是否会危及加害者3个问题,南京人民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次即向东史郎及其支持者转交7大类54件证据,其中包括:33种42件当年地图及2张航拍历史照片,这些均能证明当年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确有水塘;江苏省和南京市邮袋调拨局出具的关于邮袋尺寸、质地和字样的证明书,证明当时的邮袋确能装下一个人;经两次手榴弹爆炸试验,均成功地证明,手榴弹的爆炸不会对加害者构成威胁。种种证言、证物,均证明了《日记》中记述西本残害南京市民情节的真实性。由此可见,《日记》所记录的内容,真实可信,无懈可击。

二是内容的完整性。

近年来,以中文出版的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资料主要有:1984年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森山康平著《南京大屠杀与三光作战——记取历史教训》,1985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小俣行男著《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南京大屠杀……》,1995年由香港昆制作公司出版的陈辽编《南京大屠杀真相》(内含“日本人笔下的南京大屠杀之一至之七”),199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南京大屠杀》(内含“日本官兵和随军记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日记、目睹记”),1997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合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内含“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攻占南京前后有关大屠杀的日记和笔录”),199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内含“日军官兵的供词与证言”)等。这些资料的共同特点是信息量大,包含了多名日人证言的片断和摘录。而《日记》则是一名日军士兵连续军事活动的记录,它包括了东史郎自1937年8月26日奉召出征至1938年九十月间部队生活的完整记录。

与1987年由日本青木书店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出版的日记相比,那本日文版日记只有20万字,属日记节选本;而中文版《日记》则有37万字,系对日记全文的直译。《日记》的完整性,更加有助于读者了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行为,以及解剖日军个体在施加暴行时的复杂心态。

三是揭露的互补性。

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中,目前公布较多的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第三国人士的证言。幸存者作为暴行的直接受害者,其证言真切感人,震撼力大;第三国人士的证言,如《拉贝日记》、“贝德士文献”、“安全区档案”等,其证言客观公正,可信度高。与上述两类资料不同,《东史郎日记》则从加害者的角度,用一名军国主义士兵的立场和观点,不加修饰地暴露了加害者的残忍行为和复杂思想。正如东史郎在《日记》出版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我就是那个被称为东洋鬼子的东史郎”,“我的日记与《拉贝日记》不同,是加害者的日记。”以这一特殊身份和视角对日军暴行的揭露,是研究南京大屠杀资料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加害者与受害者、目击者不同。加害者在叙述所见、所闻、所为暴行时,可以叙述自己当时特殊的思想和感情,这是任何其他身份的证人所不能代替的。《日记》在叙述日军烧、杀、淫、掠暴行时,都包含了东史郎当时心理状态的素描。如:12月4日,东史郎所在部队在句容附近的一个村庄残杀了5名男子、1名女子,并放火烧了这个村庄。《日记》写道:“对于我们来说,放火已成了家常便饭,觉得比孩子的玩火还要有趣”,“我们变成了杀人魔王,纵火魔王。”(第154页)曾有卫生队的一位士兵告诉东史郎:“在南京的时候,从难民区弄来大约三十个姑娘。我们也沾光,几乎每天有女人陪睡。”东史郎写道:“这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儿啊!他们的最高追求就是欲望、酒精和女人。”(第264页)日军在大肆掠夺之后,还恬不

知耻地说：“这不是掠夺，是征收。是胜者之师必须进行的征收。”《日记》写道：“不知怎么，掠夺这个词让人觉得心情黯然，而说征收，便不会感到罪恶。”（第65页）

《日记》的出版，为南京大屠杀和侵华日军暴行的研究，增加了一份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如：《日记》记述了1937年12月19日左右在麒麟门附近处死7000名俘虏的暴行，称：“在马群镇警戒的时候，我们听说俘虏们被分配给各个中队，每一中队两三百人，已自行处死。”“七千人的生命转眼之间就从地球上消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第204页）这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的统计，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言。1938年1月24日描写南京江边景象的一段日记写道：“天一亮，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令人目不忍睹的情景——沿江岩壁，牛猪般惨遭屠杀的敌军尸体——司空见惯的黑尸体，像被充了气，膨胀得几乎快要破裂的尸体犹如一堆大肥猪在水边堆积如山。”（第218—219页）这一场景，证实南京江边在城陷40天后，仍然尸积如山，令人目不忍睹。

《日记》无情地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出自侵华老兵东史郎之手的日记，其所揭露的暴行，具有特殊的说服力。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以否定南京大屠杀为突破口，全盘否定当年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日记》以一名侵华士兵的身份现身说法，告诉人们他们当年是如何进行南京大屠杀和各种暴行的。那些由浓厚军国主义思想和部分良心未泯的情感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态，以及在这种心态下干出的罪恶暴行和其他行为，读来真切自然。对于这些暴行制造者记录、承认和公布的事实，右翼势力将无法否定。这是暴行制造者的声音。它向人们揭露，那些骇人听闻的屠杀及其他暴行是怎样被一件件制造出来的。它的每一段浸血的文字，都是对翻案谬论的有力批驳。

《日记》的出版，还是对“东史郎诉讼案”的有力支持和声援。由

于日本右翼势力的精心策划和操纵,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先后判决东史郎败诉。东史郎已在1998年12月25日向东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目前正在等待着东京最高法院的终审裁判。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候,《日记》在中国出版,这表明了中国人民对东史郎正义行动的肯定与支持。一部被日本法院宣判为“不实”、“虚构”的日记,却在中国隆重出版。同一部书,在日本和中国的遭遇截然不同。中文版《日记》的出版,对于那些企图继续否认历史真相的人们,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与此同时,东史郎本人及其支持者则从中感受到宝贵的援助和极大的鼓舞。

(作者孙宅巍,1940年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兵)